

一、传统心态与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思想界 认识世界的变化趋势

19 世纪中叶，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进入它的暮年时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酝酿着一场剧烈的社会变动。1840 年的鸦片战争更加剧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最受震动、最为敏感的莫过于思想界的变化。探讨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认识世界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日新月异的世界形势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从妄自尊大到开眼看世界的转化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昧于世界大势，是众所周知的。1793 年，乾隆皇帝在答复英国公使马尔夏尼通商要求时所夸耀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和 1808 年，嘉庆皇帝的谕旨中论及中英两国的地位时所宣称的“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

宾，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1]等都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世界大局的无知和虚骄。这种妄自尊大的思想意识不仅存在于最高统治当局，而且在知识界中，许多人也是“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2]，对世界的认识同样非常模糊。

但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列强力图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19世纪初叶，封建士大夫中的少数有识之士朦胧地感觉到这一点，开始逐渐睁开睡眼来观察这变化万端的世界。思想界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提出“采阅外情”的主张，重视对世界的认识。“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传统战略思想，使思想界中的有识之士在形势的逼迫下，较为敏锐地触到了时代的脉搏，并且在“知彼”的传统思想上涂上了时代的色彩，即把视线转移于对“外情”的了解。封建知识分子叶钟进最早提出“采阅外情”的思想。他在《英吉利国夷情记略》一文中，对澳门出版的各种新闻纸给予高度的重视，认为新闻纸内容广泛，“苟当事留意采阅，亦可觐各国之情形，皆边防所不可忽也”^[3]，明确地把“采阅外情”的主张与反殖民主义侵略的要求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认识在当时是很可贵的，可以说是在井蛙观天的思想界中吹进了第一丝清新的春风。魏源认为“采阅新闻纸”的建议是“驭夷”的要策，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

毫无疑问，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步步紧逼，先进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必然是从反侵略这个中心展开的。广东南海人颜斯综在《海防余论》中认为：“驭夷者必先得其情而后有消其桀骜之气，折冲万里之外。”^[4]他与叶钟进一样提出了重视“外情”的类似主张。爱国主义者姚莹对了解“夷情”也较早就加以重视。在福建龙溪任知县时，曾翻阅过当地商人王大海所著的《海岛逸志》和陈伦炯所著的《海国闻见录》，其中王大海述及“英吉利

蓄心叵测，制为鸦片烟土，以毒中国，既竭我之财，又病我之人”^[5]等等情况，引起他对外国情事的关注。因此，早在鸦片战争前，姚莹就开始注意搜集外国书籍，“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6]。他的著作《康輶纪行》、《东溟文集》等鲜明地反映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对世界知识的探索 and 追求。

“采阅外情”主张是鸦片战争前夕思想界从妄自尊大到开眼看世界这种思想认识转化的信息。此后不久，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到广东领导禁烟运动，“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7]，认真研究外国的情况，更集中地反映了“开眼看世界”这股新思潮在思想界中崛起的趋势。

其二，指出“外夷”的侵略性，提出“以夷伐夷”的反侵略思想。

鸦片战争之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尤其是英国日益频繁的侵华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关注。少数有识之士提出了“以夷伐夷”的反侵略思想。

谢清高在其口述的《海录》一书中就曾提到：英吉利“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英吉利）国虽小而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8]。谢清高的这种认识虽然还很肤浅，但却正确地指出了英国是一个“急功尚利”，四处争夺，侵略性很强的国家。何大庾对英国的侵略性讲得很清楚，他说：“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骘骘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9]深切地表明当时的人们日益感到殖民主义侵略的潜在威胁。1827年，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先驱者龚自珍看到英国鸦片走私的猖獗活动，深感忧虑。他尖锐指出：“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

关，狎之则蠹国。”^[10]叶钟进也揭露英国每“遇可乘之隙，即用大炮兵船占踞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11]的贪婪本性。颜斯综则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急于打开中国大门的野心作了剖析，他指出，对于“天下富庶无如中华”^[12]的中国广大市场，英国早有觊觎和“垄断之心”^[13]。

此外，人们对沙俄、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殖民国家的侵略性，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俞正燮早在嘉庆年间就写成《俄罗斯事辑》一书，对清俄的边疆关系作了叙述，提醒人们对这个好战的毗邻大国的警惕。此外，他在《澳门纪略跋》一文中还告诉人们，荷兰、红毛英吉利、佛郎机、大吕宋、意大利亚等，“皆工器械，鹜利耐远贾，沿海而东而南……此数国者，远隔重洋，辛苦远戍，其用意甚深”^[14]。

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侵略的潜在威胁，使得“识者每以为忧”^[15]，因而人们也相应提出了一些反侵略的主张，其中最有意义的是萧令裕提出的“以夷伐夷”的思想。萧令裕在《记英吉利》一文中曾提出，英国“精修船炮，所向加兵。……西南洋之印度及南洋濒海诸市埠与南海中岛屿，向为西洋各国所据者，英夷皆以兵争之，而分其利。……”^[16]因此，他以自己所能理解和认识的程度，看出“夷国”之间因争利而存在着种种矛盾，认为英吉利不仅与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不和，而且与美国、法国也“夙与仇讎，”因此，在反侵略斗争中应充分利用这些矛盾，“使相攻击，以夷伐夷，正可抚为我用”^[17]。萧令裕这种“以夷伐夷”的反侵略思想对当时及以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述的两种思想发展趋势在鸦片战争之前虽然并不十分明显，但是，任何思想都有其继承性，“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思潮正是在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思想变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鸦片战争爆发后，以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为杰出代表的近代思想

家，承先启后，加深对世界的认识。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编译《四洲志》、《华事夷言》、《澳门日报》等等，既是叶钟进“采阅外情”说的继承和发展，又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魏源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思想，更是萧令裕“以夷攻夷”说的进一步发挥。姚莹在鸦片战争前就留心外洋情事，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痛感“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陵，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18]。因此，他不但积极“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而且还“著之于书，正告天下”，希望能使“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19]。

倘若说，促使先进的中国人从妄自尊大开始转向开眼看世界是基于西方殖民主义者日肆猖獗的侵扰，那么，“开眼看世界”这股时代思潮的形成则直接来自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军舰和大炮的刺激。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途径正是这样围绕着反侵略的中心展开的。

二、“经世致用”与“西学为用”的接踵并进，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艰难跋涉

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出现种种“衰世”的迹象，引起人们的不安。面对这种“衰世”，封建士大夫中的开明人士从沉迷于故纸堆的训诂考据转向了“经世致用”之学，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到如何使统治阶级的统治长治久安的问题上。龚自珍根据今文经学的历史观，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劂改革，孰若自改革”^[20]？魏源也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统治阶级制定的法令制度等也要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不能泥守古法，一成

不变。这些“变法”改革思想，正是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精华，对于晚清沉闷的思想界，犹如一石投入死潭，荡起了层层波浪。后人评述龚自珍的思想时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龚、魏等人的学说，开了一代崭新的学风。

正当思想家们感叹“衰世”，寻求补救之法时，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又为他们推出了新的现实课题。这就在刚刚激荡开来的“经世致用”思想中迅速加入“西学为用”的内容，并且愈来愈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经世致用”和“西学为用”是一种接踵并进的关系。

在这方面，思想界的变化也有两个明显的趋势。

（一）从边疆史地的研究扩大到世界史地的研究。

龚自珍的“经世致用”思想除了猛烈抨击封建政治的各种弊病，揭露各种社会矛盾之外，最为身体力行的要数他对边疆山川地理形势的研究和考订。他希望以这种研究服务于边疆防务，达到“防乱于极微，积福于无形”^[21]的目的。1820年，龚自珍写了《西域置行省议》一文，针对西北边疆的实际情况，提出新疆防务理论与移民实边的具体措施。他还抄录了许多有关边疆史事、地理山川的记载，如《最录平定罗刹方略》、《最录西藏志》，写了《蒙古水地志序》、《青海志序》、《乌梁海志序》等文章并打算自撰《蒙古图志》，对边疆地理山川进行全面的考证，可惜书稿才完成一半，家遭火灾，书稿及资料尽焚。尽管如此，龚自珍对“西北两塞外部落，世系风俗形势，原流合分”^[22]的研究仍然孜孜不倦，并且把他研究考证的结果上书“当事诸公”，希望能成为统治者制定西北防务的参考。

龚自珍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对当时的人们影响很大，并逐渐形成一种学术思潮，特别是鸦片战争的爆发，更激起人们对边疆

形势乃至世界形势的注意，从而使原来仅限于边疆史地的研究很快扩大到世界史地的研究。如在鸦片战争中曾领导台湾军民抗击英军进犯的台湾兵备道姚莹，因受到投降派的诬陷，数度奉使西藏，他深切感到研究边疆对国防的重要性，使用数年时间，经深入探索和实地调查研究，写成了介绍我国西藏地区，进而论及藏外印度、尼泊尔以至英、俄等国情况的《康輶纪行》，他说：“外蕃异域之事，学者罕习，心窃疑之。虽历代外夷史皆有志，而今昔不同，要当随时咨访，以求抚驭之宜，非徒广见闻而已。”^[23]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的某种趋势。《朔方备乘》的作者何秋涛也说：“昔夷务之兴，中国患不知远人情伪，今之所记，安知不收一壶千金之用，是在筹边者加之意而已。”^[24]王鏊在为谢清高的《海录》所写的序中说得更明确：“方今烽烟告警，有志者抱漆室忧葵之念，存中流击楫之思，外洋舆地不可弗考也。”^[25]因此，在这一时期有关边疆史地、世界史地的著作大量出现，诸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枬的《海国四说》、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长篇巨著。这些著作的出现，一则反映了此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民把眼光转向世界的发展趋势；二则反映了“经世致用”和“西学为用”接踵并进的时代特征。

(二)从“剿”、“抚”两端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反映了对外国认识的微妙变化。

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顽固派和投降派对“外夷”的认识是颠预可笑的。顽固派把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看成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主张“剿”；投降派则把外国侵略者奉若天神，屈服于洋枪洋炮的威力，主张“抚”，实质上就是乞降求饶。不过，前者的“剿”，也并不是立足于维护民族的独立，领土的完整，而是愤于“天朝上国”在区区岛夷面前失了体面，伤了尊严。他们不了解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因此，跟外国侵略者交手的结

果一般都是从“剿”字始，以“降”字终，与投降派殊途同归。

与上述两者相反，一部分开明的封建士大夫虽然也认为“中国之御四夷也，来则抚之，贰则绝之，此不易之道也”^[26]，但他们思考更多的是应该如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这个强敌。因此，在他们看待“夷狄”的传统观念中隐藏着“变”的契机。例如，他们在提出与贩卖鸦片的英国断绝贸易往来的同时，主张对“诸蕃非英夷属者，仍贩易如故，加以约束”^[27]。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中更是坚持“薰莠有别”的方针，把“惯贩鸦片之奸夷”与“不卖鸦片之良夷”明确分开。这些都反映了对外政策上的一种灵活性。

形势的发展迫使人们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思维方法去适应新的形势。林则徐不仅认识到“夷”有“良夷”和“奸夷”之别，而且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28]，以对付“船坚炮利”的侵略者。魏源也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29]正是在强调“悉夷情”、“翻夷书”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一般来说，我们都赞同“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也是当时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思想的集中表现，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中所包含的更为深远的寓意。如果说，封建统治者历来都是以“内中国外夷狄”的眼光看待中国之外的世界，在对待“夷狄”的办法上总离不开“剿”“抚”两端的传统方针的话，那么，“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则了不起地改变了这种僵化的传统意识！首先，这种主张公开承认“夷”也有长技，有比中国优越的东西存在，这就等于在否认“天朝”无所不有的传统观念的同时，摘下了视外国为“化

外之邦”的有色眼镜，从而使转向世界的眼光变得更加清晰，更加有现实意义；其次，既然“外夷”拥有长技，那就有学习的必要。这种“师夷”的思想不但包含有为形势所迫，为急于富国强兵所激励的一面，还包含有以平等的态度重新认识“外夷”，把中国置身于竞争的世界之中的一面。所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不但集中表达了向西方学习的要求和愿望，而且还孕育了近代外交思想的胚胎和萌芽。尽管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无法使它正常发育成长，但历史却为我们指示了这种发展的方向。

三、对“夷情”的重视从情报性质转向全面介绍，促进了东西方的了解和交流

毋庸置疑，不论是叶钟进的“采阅外情”说，还是林则徐的“采西学”、“译西书”，他们最初的目的都归结到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上，因此，他们对“夷情”的重视主要集中于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等军事情报方面。但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促使许多有识之士切望更多地了解世界，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出现了许多有关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行政管理、商业贸易、文化教育等等情况的介绍，从而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促进了东西方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

从著作出版发行的情况来看，此一时期介绍和传播西方知识开始蔚然成风。战前，谢清高的《海录》、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澳门纪略跋》、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等著作都介绍过外国的一些地理山川、风土人情，但范围较窄，也比较粗浅零散。战后，通过对外国书籍、外国报刊的翻译和传播，以及向外国人了解西方情况等各种途径，林则徐的《四洲志》介绍外国情况的范围扩大到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魏源的《海国图志》更成为中国当时关于世界各国概况的最为详备的巨著。左宗棠称之为“以西人谈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统纪，征其俗尚而得其情实，言必有伦，所拟方略，非尽可行，而大端不能加也”^[30]。姚莹的《康輶纪行》对西南边疆形势进行了考察，记载了不少有关英、法、俄、印度、廓尔喀、哲梦雄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概况。还有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夏燮的《中西纪事》、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对西方国家的情况，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叙。这些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加深了人们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

如《海国图志》，除了详细介绍西洋的船炮、地雷、水雷、望远镜等武器装备外，还以 2/3 以上的篇幅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魏源在书中介绍英国的议会制度说：“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Parliament，议会）衙门，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31]还说“巴厘满”由议员一百十三人组成，议员由各地士民推举，凡征税、行政、外交诸事都由议会议定。在介绍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时，他感叹说：“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魏源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介绍虽然还很肤浅，但是，思想意识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与封建帝王专制统治迥然不同的全新观念的输入，必将要引起习惯于专制淫威下的人们的重视和深思。历史证明，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仿效和学习正是从对其的赞美而发其端的。

《海国图志》还介绍了西方文化艺术、社会习俗、婚姻制度等等。那些“男女平等”之类的道德准则，对于长期接受封建传

统礼教熏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新奇而又新奇的事情。至于说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火轮船航河驶海不待风水”，陆运“用火车往来，一时可行百有八十里”^[32]；“机房织造不用手足”，“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关，有如骤雨”^[33]等等，更使当时人们惊叹为“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斯？”^[34]

所有的这些，都说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随着“开眼看世界”这股时代思潮的兴起，中国对西方情况的考察重点开始从单纯的军事技术转向全面介绍。尽管这些介绍还较粗浅、零散，但毕竟使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知道了历来被视为“化外之邦”的“蛮夷”竟然也有高度的文明和发达的技术，人们视野的扩大必然会促进东西方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也进一步激发了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外部世界的勇气和决心。

封建顽固派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是“立国之道在礼义不在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们对日渐兴起的“开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思潮抱着偏见和无知而极尽阻挠反对之能事，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比喻过的，既然密闭的棺木已被打开一道缺口，封建的木乃伊再也不可能安然处之^[35]。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思想界认识世界的变化趋势，恰恰就是在人心的向背上冲击了封建统治的“立国之道”和“根本之图”，并为后来的中国人启迪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

（本文为“纪念林则徐诞辰 2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原载《福建论坛》，1985 年第 4 期）

[1] 《仁宗睿皇帝实录》第二〇二卷，第 3 页。

- [2] 魏源：《圣武记》卷十二。
- [3] [4] [8] [11] [12] [13] 魏源：《海国图志》第五十二卷。
- [5] 姚莹：《康輶纪行》卷十“海岛逸志”条。
- [6] 姚莹：《东溟文集》卷三。
- [7] 《魏源集》第 174 页。
- [9] 魏源：《海国图志》第十五卷，第 20~21 页。
- [10] 《龚自珍全集》第 229 页。
- [14]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五。
- [15] 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十三，第 6 页。
- [16]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三，第 1 页。
- [17] 《粤东市舶论》，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九。
- [18] 姚莹：《康輶纪行》卷十二。
- [19]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
- [20] 《乙丙之际著议第七》，见《龚自珍全集》第 6 页。
- [21] 《龚自珍全集》，《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第 312 页。
- [22] 《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同上书，第 313 页。
- [23] 《康輶纪行》自叙。
- [24] 《朔方备乘》卷三十九，记一。
- [25] 王鏊：《海录序》。
- [26] [27] 《绝英吉利互市论》，见《鸦片战争文学集》第 985 页。
- [28] 《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卷四。
- [29] 魏源：《筹海篇》三，第 2 页。
- [30]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
- [31] 魏源：《海国图志》卷四十九。
- [32] [33]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一。
- [34] 《贸易通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
- [35]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第 3 页《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传统心态和鸦片战争

中国辽阔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长期而稳固的农耕自然经济，以及高度发展的封建专制政治体系和相当成熟的封建文化，使得古代中国人——上至天子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在头脑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以中国为天下之中心，中国以外的地方为“蛮夷之邦”、“化外之民”的观念。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的积淀就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定势，我们亦可以称之为传统心态。千百年来，中国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种传统心态来看待不断变化中的外部世界，而当世界开始逼迫中国也迈入近代的门槛时，中国人就不得不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808 年，嘉庆帝在答复英吉利使节罗尔美的一份谕旨上宣称：“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宾，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然而，20 多年后，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并不起眼的“蕞尔夷邦”却打败了堂堂的“天朝上国”，嘉庆的后继

者道光帝不得不在无可奈何的忍痛中接受了英国的城下之盟。历史对封建统治者开了一个残酷而无情的玩笑：“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被传统心态所左右的封建统治者，艰涩地吞下了自己种下的苦果。本文就鸦片战争时期传统心态对清朝统治者的影响，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帝从主战到最后被迫接受和约，经历了一个多次反复的过程，使鸦片战争出现了打——谈——打——最后降的局面。这种情况的发生，与传统心态对道光帝的对外认识及其战争决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首先，迷信“天朝上国”的尊严，使道光帝对战争的爆发缺乏预见性。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林则徐在广东采取严厉的禁烟措施，取得了“虎门销烟”的历史性胜利。但对于英国殖民主义者急切地想以鸦片侵略打开中国古老大门的野心来说，这种胜利也隐伏下殖民者借机挑起事端，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在写给英国外交部大臣巴麦尊的密信中就说过，中国严禁鸦片，“乃是陛下政府对过去所受一切损害取得的补偿的最好理由，这是把我们将和这个帝国的商务安放在稳固而广阔的基础之上的最有希望的机会”。另外一个名叫安德鲁·韩德森的鸦片商说的更露骨，他说，禁烟“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一场以鸦片为借口的侵华战争已迫在眉睫，但作为清朝当局的最高决策人，道光帝显然对此缺乏认识，在道光帝看来，

禁绝鸦片只是大清帝国一厢情愿之事，“我为上国，率土皆臣”，尊口一开，烟害即除，区区“岛夷”不会也不敢冒犯天威！因此，当 1840 年 4 月，他接到林则徐有关英国“有大号兵船将次到粤”这类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时，并没有引起高度警惕，仅仅是象征性地批复几字：“无论虚实，总当不事张皇，严密防范，以逸待劳，主客之势自判，彼何能为也？勉之！”实际上并没有把英国的举动放在眼里。甚至当英军北上围攻浙江定海时，道光帝仍然认为：“此等丑类，不过小试其技，阻挠禁令，仍欲藉势售私，他何能为？”还没有意识到英国殖民者已蓄意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直到当年 7 月浙江定海被英军攻陷，道光帝才看到事态的严重，但仍想不出英军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惟致寇根由传闻各异，有云绝其贸易，有云烧其鸦片，究竟启衅实情，未能确切”，充分反映了一个长期在“天朝上国”传统氛围熏陶下，对世界大势缺乏必要的基本知识的封建君主形象。

其次，传统心态的影响，导致道光帝在战争决策上的忽战忽和。

《皇朝文献通考》有这么一段话：“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大清皇帝就是膺天宝命，统一万方的天子，“普天率土，悉属臣民”，因而，中国与周边“四夷”的关系历来都是华夷、宗藩的关系。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中，其基本指导思想便潜意识地掺进了以尊临卑、华君夷臣的观念，反映在具体的对外政策上就是恩威并用，剿抚兼施；倘其输诚慕化，不妨怀柔羁縻，以示天恩浩荡；倘其桀骜不驯，则只有大张挞伐，示以天威凛凛。

因此，尽管有清一代到了道光朝国力早已是江河日下，今非昔比，然天朝的威严则总得维持，道光帝也是这样。定海被英军